

10.10

# 无锡革命史料选辑

第十四辑

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编  
无 锡 市 档 案 局

# 无锡革命史料选辑

第十四辑

中国革命博物馆南京分馆编

南京出版

# 无锡革命史料选辑

第十四辑

内部发行

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无锡市档案局

编

封面设计 吴 农

无锡革命史料选辑

第十四辑

---

无锡市太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字数 100000 印数 4000

1989年9月印 工本费1.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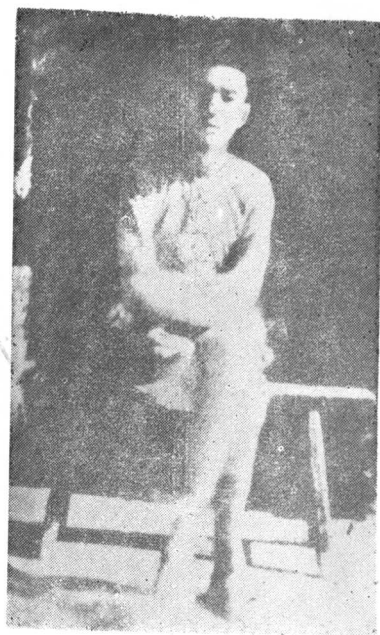
---

江苏省内部报刊准印证第3076号



邓华烈士

张涛烈士



1957/1896/24



演剧九队在驻地秦家祠堂排演《星期音乐会》节目(方行提供)



公益小学旧址

## 目 录

### •回忆录•

- 忆青年时代革命生活片断.....陈志方 ( 1 )
- 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回忆.....杨兰珍 ( 8 )
- “青救”二三事.....惠永昌 ( 17 )
- 忆无锡公益小学党支部.....范文贤 ( 24 )
- 女青年读书会及其他.....安荔裳等 ( 32 )
- 配合民主运动 唱出人民心声
- 忆演剧九队在无锡.....汤 扬 ( 38 )
- “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
- 回忆《丽人行》的首次公演...朱琳 赵元 田野 ( 44 )
- 忆解放前地下教工工作片断.....何 刚 ( 58 )
- 回忆渡江南下接管无锡市的干部大队.....臧晨光 ( 62 )

### •在锡城解放的日子里•

- 人民的爱.....何幸若 ( 70 )
- 黎明的电波.....达光 马方 ( 72 )
- 留锡迎解放.....孙翔凤 ( 76 )
- 会师前后.....吴 魁 ( 80 )
- 自家的军队.....白 丁 ( 83 )
- 我被国民党匪军拉夫.....新 华 ( 88 )
- 登记前后.....吴和鸣 ( 88 )

|                      |            |
|----------------------|------------|
| 无锡工人学生的欢笑·····       | ( 90 )     |
| 忆解放初期的无锡市军管会文工团····· | 陈应华 ( 92 ) |

### ·专题调查·

|                  |                 |
|------------------|-----------------|
| 无锡沦陷前后的日军暴行····· | 董德范 王瑞权 ( 97 )  |
| 宜兴解放纪实·····      | 李明毅 ( 105 )     |
| 宜兴解放初期的剿匪肃特····· | 蒋锡初 唐顺荣 ( 111 ) |

### ·人物事略·

|              |                     |
|--------------|---------------------|
| 冯金妹烈士传略····· | 王 鹰 ( 124 )         |
| 陈凤威烈士诗选····· | ( 129 )             |
| 怀念邓华·····    | 马 平 ( 138 )         |
| 张涛烈士传略·····  | 荣宝甫 李广平 匡一民 ( 142 ) |

### ·史海点滴·

|                        |         |
|------------------------|---------|
| 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及主要负责人·····  | ( 16 )  |
| 中国妇联历次代表大会及主要负责人·····  | ( 69 )  |
| 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主要负责人····· | ( 75 )  |
| 新四军抗战史上的第一·····        | ( 37 )  |
| 中共一大代表的归宿·····         | ( 61 )  |
| 冯玉祥赋诗《二百条鱼》·····       | ( 79 )  |
| 史海点滴(一)·····           | ( 7 )   |
| 史海点滴(二)·····           | ( 85 )  |
| 史海点滴(三)·····           | ( 87 )  |
| 史海点滴(四)·····           | ( 110 ) |
| 史海点滴(五)·····           | ( 123 ) |

## 忆青年时代革命生活片断

陈志方

1906年农历六月初十，我出生在无锡张泾桥陈家巷一户日渐贫困的“书香门第”。母亲对我十分宠爱，她经常嘱咐我要奋发上进，用功读书。母亲的教诲，生活的磨难，使我自小养成疾恶如仇、爱打不平的要强性格。记得我有个伯父，是前清秀才，光复后隐居家园，整日吸大烟，摆威风，十足的绅士派头，家人均对他畏惧，称他为“大老爷”。可我却不买他的帐。在我十一二岁时，有一天，这位“大老爷”的霸道行为使我十分气愤，我拿起菜刀要杀他。当时这位“大老爷”被我追得跑了几圈，吓得失去了昔日的威风。

我幼时很喜欢打台球（乒乓球），也喜欢玩照相。因无钱购相机，我就以凹凸镜自制相机，邻里人称我为“工程师”。我曾组织台球社到处比赛，还获得过全县冠军。1924年，我在台球比赛中遇到私立杨氏艺芳小学体育教员陈明岷（陈叔璇）。他看到我对社会有不满和反抗情绪，就介绍我加入国民党，引导我参加革命斗争。我曾与陈明岷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会见朱季信和姜长麟，参加追悼廖仲恺的活动。之后秘密回无锡担任国民党党部西区的常务委员，开展工人、学生运动。当时我办了一个无锡青年会，组织青年工人、学生以学习文化、举行台

球比赛等活动为名，宣传革命，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活动。我们还经常到学校、工厂宣传北伐革命，鼓吹中国只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豪绅地主，打倒帝国主义，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富强，才有出路。

1925年，上海党组织派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周启邦来无锡，和我共同在西区创办平民夜校，招收了60多名学员，后来成为秦邦宪妻子的刘群仙也参加了学习。当时活动经费很少，环境十分艰险，但我们都很年青，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对革命事业满腔热忱。我变卖衣物，自己拿钱购置文具，租赁房屋。我们自己动手修理桌椅、电灯……。有一次我在修理电灯时不慎触电，差点身亡，幸周启邦迅速用木棒将电线拨开，才使我得救。至今我的左手上还留有一块电击的疤痕。

1925年春，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为了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我们四处奔走，向人民群众介绍五卅惨案的事实真相，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整个无锡沸腾了，工人们纷纷募捐，仅3枚、5枚的铜元就整整积满了3只肥皂箱。

1926年，党组织从上海派共青团负责人乔心全来无锡找我，于6月介绍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我们以办青年会为掩护进行cy（共产主义青年团）活动。

父母去世后，我考入上海南洋学院。后来由于闹学潮，根据组织指示，我转学到广州。

我到了广州，看到当时作为北伐军前进基地的广州，革命气氛极浓，街上贴满了红标语，各界群众组织很活跃。我因未带转学证书，先进行入学考试，考进中山大学医预科，后又进行插班试读，编入医本科三。记得入学注册那天，因为我们一个铜板的学

费都不愿意交，学校不同意给我们注册。我们和注册部的人辩论起来：“中大是孙总理创办的最高学府，是培养革命人才的地方，怎么还要交学费？为什么不和黄埔军校同样待遇？”后来校方只好同意给我们注册上课。

在中山大学医学院里，进步学生很多，鲁迅先生又是我们的教务长。学生中的共青团员、共产党员人数也不少。cp（共产党）、cy活动十分活跃，反动组织“树的党”也很活跃。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充满校园，同学们革命热情异常高涨，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但是，随着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迅猛发展，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益尖锐。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继上海“四一二”政变之后，4月15日以新军阀头子钱大钧为首的反动当局也在广州开始了大逮捕、大屠杀。中山大学也在西山会议派头子戴季陶控制下进行了血腥的逮捕和屠杀。

记得4月15日那天清晨，反动军警在反动派“树的党”带领下，凶神恶煞似地冲进学生宿舍，到处抓人。他们在房门口，按照黑名单一一点名，凡被叫到的同学，一出房门就被捆绑起来。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未答应。这时已被捆绑起来的金世杰掩护我说：“他不在，出去看电影了。”恰好一个姓罗的同学（群众）出去看电影未回，我将计就计，冒名顶替，这样才幸免被捕。但是，金世杰和其他许多被捕的革命同志一样，不久就被装进麻袋扔进珠江，壮烈牺牲！

同志们对于反动派的暴行极为愤慨。为营救被捕的学生，我们集合进步同学，包围了中山大学副委员长朱家骅的住宅，同时把反动学生也集中看管起来，以防他们密报警察抓人。同学们推

选我和其他5位同学当代表与朱谈判。我们6人冲进朱宅，把电话线切断，严厉责问朱家骅为何在青天白日之下，在孙总理首创的最高学府，允许新军阀非法逮捕学生？这何异于北洋军阀？当时穿着睡衣的朱家骅面对我们这样激愤的情绪，吓得浑身发抖。

为了表示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暴行的强烈不满，我们押着朱家骅一起到医学院电影室去开会，向朱提出一系列责问和要求，把他问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会上当即成立了医学院被捕同学后援会，并令朱为主席。当外边解除戒备后，我们又挟持朱家骅乘他的私车到中山大学校部大钟楼教务会议室参加教职员和学生联席会议。路上我们警告朱，不准他送我们到警备司令部去，否则同归于尽，朱吓得不敢动弹。

出席大会的有100人左右，除教授外，还有不少学生，左派、右派均有，也有一些“树的党”的代表人物参加。我们押着朱家骅一进会场，就大声高呼：“打倒新军阀！”“打倒树的党！”会议是由鲁迅先生主持的。会上当场募捐200余元大洋。大会决定由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代表后援会买了许多罐头、饼干等，到永汉南路南关戏院（临时拘留所）去慰问被捕学生。

校方在群众的压力下，表面上作了一些让步，答应请钱大钧释放被捕学生，而实际上却与反动当局加紧勾结，到处抓人，杀害进步学生，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从此我再也无法返回中山医学院了，党的组织也找不到了。当时我有一个姓吴的同乡，在医学院当校务主任，比较左倾。他派人在路上告我，军警已到学校抓我好几次了，不能回校。当晚我跑到沙河，得到第六期黄埔入伍生团卫生队长（系无锡同乡）的帮助，他给了我30元大洋。几天后，我冒着危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中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转入吴淞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如今在鲁迅先生博物馆内陈列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开除中山大学进步学生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当时名陈士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我更加坚信只有马列主义才是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在1927年8月暑假中，我由无锡县委委员陈明崑、孙逊群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从此，我往返于上海、无锡两地，积极从事党的活动，和同志们一道，坚决和国民党反动派危害革命的反动行径作斗争。党的“八七”会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八七”会议后，党在全国许多地方先后发动了农民、工人、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参加的武装起义。1927年秋天，我参加了无锡地区秋收暴动的筹备工作。当时我外祖母家——观前街20号是县委设立的最秘密的联络点，县委委员经常在这里开会、联络。记得起义前曾在此处开会研究如何组织“工人赤卫队”策应农民起义的问题。会上决定起草告市民书及标语口号，分头调查城区驻军、警察、商团的人数、枪枝、驻防地点等。但是，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到一周，县委、工人运动地下机关就遭破坏。为了以防万一，组织决定派我回上海向省委报告请示。在我们撤离后，伪公安局就派警察到观前街搜捕，一无所获，最后将我的哥哥陈铁生当作嫌疑犯捕去。我迅速赶到上海，向省委报告了情况。省委根据我的报告，修改了起义计划，无锡地区在11月9日爆发了秋收起义。

寒假时我回到无锡，因县委已遭破坏，我在外祖母家被捕入狱。反动军警当时在现场搜出县委在组织东北乡暴动时遗留下来的四粒子弹、一张有外国人的照片及武汉大学朋友寄给我的信。

反动派即以此定我的罪，硬说子弹是共产党暴动的证据，照片中的美国人是苏俄人，武大同学来信是与共产党联系的证据。敌人软硬兼施，将我戴上手铐，转到县府监狱，关押两月余，审讯两次，以后又转押到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关押五六个月，审讯三次，但是我始终未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每次审讯都一口咬定说：子弹是黄埔军校入伍生团朋友送给玩的，照片上是美国人，武大同学来信是友人关系。这时党组织也在四处活动营救我。经多方努力，最后找到我的南洋医大同学卫质文，他是蒋介石总部军需处长、国民党中央委员缪斌之师，并在缪处任科长，由他转请缪斌、周启纲两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保我出狱。由于我始终未暴露身份，特刑庭只好宣判：“事出有因，查无证据，交保释放。”但四粒子弹要罚款90元，实际上只打了个欠条。在南京特刑庭时，刘瑞龙同志也同狱关押。

出狱后，江南省委派蒋庸（陈宇中）和吴国治来找我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我就在镇江开了一个“人人”照相馆作掩护，继续在江南从事党的工作。1929年我将此照相馆以600元转让给了史良。后组织决定我到中央苏区，此时党中央正在上海中华旅馆召开四中全会，反立三路线，开了10多个小时，党内斗争很激烈，情况复杂，白色恐怖又十分严重，我就在上海虹口等了几个月。1931年5月，陈云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中央苏区工作，当时与我同船的有党中央派在CC工作的胡底同志（胡底同志后来为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而被杀害）。

我进入苏区后，任粤赣军区军医处长。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结束后，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被调任中央军委军医处代处长，后又任军委总卫生部医政局长等职。

1934年，我随红军长征。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背叛中央，分裂红军。他调我任前方办事处主任。我对张的所作所为素怀不满，一次，张国焘一个亲信违法乱纪，我撤了他某医院政委的职，此事虽已报请总政副主任批准，但仍触犯了张国焘。他派保卫局执法队将我抓去，以莫须有的罪名说我搞小组织活动，是反革命“改组派”，将我关押起来。开始押在保卫局，后送军法处，我已准备死于非命，写了一信给新成立的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刘瑞龙，说我在白色恐怖下未死，今天死于张国焘之手，实在不白已极。经过斗争，他们又说我的问题已解决，但仍要针对我所谓“轻视工农”问题，由前委开一个斗争会，还决定行政给予撤销所兼各职，党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并通报全党全军，然后送我到红军大学罚做苦工。张国焘对红军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作为受害者，只不过是无数个中的一个。

---

### · 史海点滴 ·

### (一)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式上致“开幕词”，受到全场热烈欢迎。休息时，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赞扬开幕词写得简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泽东以赞赏的口气对代表们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流泪，我忍不住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笔泪。”

## 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回忆

杨 兰 珍

1937年初，我在无锡协新毛织厂做工，星期日常到杨增家玩，遇到一位在杨家的教员崔予庭（地下党工作者）。后来，又通过他俩认识了孙之遂（孙顺）。她约我星期日到她家去玩。此后，她常给我讲些时事形势，还把高尔基写的小说《母亲》借给我看，并介绍我参加工人夜校学习。后来又通过我在协新毛织厂办起了工人夜校，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形势教育。1937年“七七”事变后，无锡成立了无锡青年界抗敌后援团，由崔予庭和孙之遂同志介绍我参加了这个团体。我还动员了三四位女工一起去。因该团体内大多数都是学生和知识分子，要上街头宣传，唱革命歌曲，演话剧，几位文化低的女工就觉得困难，于是只留下我一人，其他女工退回去了。那时，日军整天轰炸无锡，国民党政府人员早已跑光，市民也大部份离开无锡，几乎成了个空城。我们这个团体共二三十人，有孙竹云、程桂芬、严永洁等在城内搞些救护工作。有时下乡做宣传工作，演些抗日的话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唱抗日歌曲，唤起群众抗日。后来就转到惠山伤兵医院做救护工作。“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更加疯狂，飞机整天狂炸，沦陷前夕，地下党将无锡80多名抗日爱国青年组织起来，撤退去溧阳，然后在溧阳组成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简

称“锡流”)，由无锡抗敌后援会为“锡流”提供活动经费。团长是孙克定，副团长钱秋苇、周秋野，党的负责人是吴志明。记得从无锡城内出发，经过我家乡陆区桥，又增加了顾凤、陆晋修、沙陆墟、冯太勋、沙肇圻兄弟等。出发时，我带了一件棉旗袍绑在身上，夜里当被盖，天气冷就穿在身上。在这个团体中，年纪最小的是杨增同志的弟弟杨云轩，只14岁，其次是程兰芬，15岁，我那时16岁。我们三个一路步行都在一起，也最亲密。一路上，一些大姐大哥都很照顾我们。每到一地，夜里都是睡地铺，我们都挤在大姐身边取暖。虽然我们每天要跑七十八里路，日军的飞机整天滥炸，而我们这个团体每到一地都要进行抗敌宣传工作。我们的队伍步行到溧阳县时，休息了几天。溧阳县抗日团体有20多人，也参加了“锡流”，一路上，经过安徽、芜湖、安庆、九江到达南昌。尽管沿途日军飞机不断轰炸，如在芜湖江边等坐轮船时，日军飞机丢炸弹，就打中了轮船。我们在码头边，机关枪就扫射在我们的周围。去上饶途中，又碰到火车出轨，但一百多个抗日青年并未受到损失，都安全到达了目的地。

1937年11月，当时南昌已将成立新四军办事处。薛暮桥和罗琼同志在南昌。这时，各地抗日青年救亡团体很多都汇合在南昌。在一次几百人的报告会上，陈毅同志作了形势报告，报告完毕，号召我们去铅山县石塘镇新四军留守处训练。我当时年纪小，又疲劳，边听报告边打瞌睡，还是孙顾同志(孙顾的妹妹)推醒了我，我举手表示同意。不久“锡流”同志就分散了，有些去桂林，有些去浙江，有些留在南昌，这都由党组织决定的。大约有100多人，仍以“锡流”同志为主，准备出发去铅山县城。当